

[文献编码]doi: 10. 3969/j. issn. 1004 - 6917. 2011. 10. 0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研究述评

刘颖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北京 100091)

[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基本上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发生的原因及社会影响和评价等方面。而对这一问题 20 世纪 50 年代初海外中国研究界也有所关注,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思想改造的目的和方法及评价等方面。

[关键词] 新中国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6917(2011)10 - 0085 - 05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多运动中,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一个重要事件。早期就有一些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著作,如刘寿祺的《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何干之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费孝通的《旧人物的改造》等。这些著作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改造情况进行了介绍和描述,可称得上是初步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史料。近年来,中国大陆和海外的研究者都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无论是国史的编撰,还是一些专著、研究论文,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将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及 20 世纪 50 年代初海外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研究中所探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简要述评。

—

总体来看,中国大陆的研究基本上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展示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来龙去脉及相关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改造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发生的原因及社会影响和评价等方面。

(一) 思想改造运动发动的过程。这场思想运动的来龙去脉是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关注的一个重点,多数研究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力图弄清

其发动、发展的始末。归纳起来,学者们大致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

1. 对知识分子从“包下来”到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论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对于知识分子最初采取的都是“包下来”的政策。他们指出:当时人民政府对从旧中国过来的全部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绝大多数继续自己原来的业务,对失业者分配适当工作,经济上给予较优越待遇,一些代表人物给予政治上的地位,并且欢迎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在此之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现状和他们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国家各项事业的表现,党中央随后制定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有学者指出“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六字方针,也就是建国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1]。

2. 运动的发起。研究者大都认为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属于最初的发起者,有些学者还进一步指出了马寅初发动这场运动的初衷。刘健清指出“思想改造运动先从北京大学肇始。1951 年 6 月,马寅初校长深感解放以来师生的进步和他们愿意把旧北大改造为新北大的热情,但又觉得在贯彻人民政府方

[收稿日期]2011 - 07 - 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YJC770057)

[作者简介]刘颖(1978 -),女,安徽人,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师,博士。

针政策方面遇到不少问题,特别是由于旧思想和旧习惯的存在,院系调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往往不易实施。于是,他在全校教职员中发动了一场学习运动,目的是想通过教职员的思想改造来推动学校的改革。随后经中央的动员,京津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逐步展开。”^[2]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当时和现在人们都认为马寅初先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始作俑者。事实并非如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由毛泽东发动的”^[3]。

3. 周恩来的动员。学者们在研究中大都认为1951年9月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起了关键性的动员作用。有学者指出,周恩来早就关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4]。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周恩来的这个报告,使听者大受鼓舞,深受感动^[5]。有些论者进一步认为,周恩来的这个报告,用意应该是两层:一是提醒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关人人都要过,躲是躲不过的,必须认真对待;但是同时,思想改造虽然由《武训传》批判引出,但不会沿用《武训传》批判那样严酷的政治斗争模式,所以不必害怕。二是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不要用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段来领导思想改造^[6]。

4. 毛泽东的公开表态。论者认为毛泽东的公开表态是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因素。论者引用毛泽东所说的“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7]毛泽东对刚刚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8]。

(二) 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和内容。关于这次思想改造的目的和学习内容,谢莹指出,根据1951年9月下旬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可知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改造思想,用改造思想来推动学校改造。而学习的内容则主要有: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9];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实践教育^[10];分清敌我阶级观点的教育;清除资产阶级思潮和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的教育,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1]。朱地根据毛泽东的话

提出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两个目的:一是从事共同的事业需要共同的语言。二是为了与知识分子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2]。于风政则认为“运动的目的:教育改革与党的领导运动的方式:人人洗澡过关。”并进一步论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由毛泽东发动的,他的目的是彻底净化知识分子的思想,建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统天下,完全不限于教育改革。”^[13]

(三) 思想改造运动发起的原因。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发动这样一场思想改造运动的原因,学者也作了分析,基本上提出了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研究者还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两点原因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1. 客观原因。论者指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发展的需要,是新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和知识分子不能满足这个要求这一矛盾所促成的。随着其他社会运动的开展,以及知识分子与一些旧事物的联系,开展一次思想革命运动,既是顺利进行抗美援朝和各项改革的需要,也是知识分子过好抗美援朝关和土地改革关的需要^[14]。而冷战时期美苏的对华政策是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国际因素;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则是思想改造运动发生的政策依据^[15]。

2. 主观原因。论者认为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亲美、反苏、疑共倾向是执政党加快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步伐的内在原因,并且高校知识分子对中国高教体制改革的强烈抵触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发生的导火线^[16]。就当时的教师思想状况来看,部分教师受资产阶级教育影响较深,亲美等思想比较普遍,此外他们还存在一些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轻视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并且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也是由于全国人民思想革命高潮的推动。新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要求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有更大的转变,因此,一切爱国、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都产生了加紧学习、改造自己的愿望和要求^[17]。于风政指出,知识分子的自卑感、愧疚感是改造的基础^[18]。

(四) 思想改造运动的评价。中国大陆方面的研究者对思想改造运动作出的大多是辩证的评价,既充分肯定了其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指出了其实践中的不足。

1. 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论者从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角度认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并且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树立工人阶级的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这不仅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且在任何时代都是合理的定律^[19]。大多数人通过学习和改造不同程度地放下了各种包袱,丢掉了盲目性,克服了旧思想,转变了立场,接受了新思想,提高了自觉性。他们感到前进有了方向和力量,开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次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继续,对帮助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习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解决其世界观中的立场问题,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实现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20]。还有一些研究者指出其历史必然性在于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改革的内在要求^[21]。一方面,这场运动促进了知识分子立场、世界观的初步转变。另一方面,思想运动有助于知识分子初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界限,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并且思想改造运动推进了教育改革、文艺革新和其他各项工作。因此,它既符合于党领导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需要,又牢牢针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现状,推动了当时各项建设事业^[22]。

2. 思想改造运动的不足。研究者大多认为,思想改造的不足是在具体方法上的失误。运动过程中由于指导思想发生了由自我教育到政治批判的转换,也就相应造成了要求上的过急过高、方法上一刀切的简单化,成为和风细雨中的苦涩^[23]。有论者还具体分析了实践中的不足主要是思想批判中对有些问题是非界限不清,对一些不该反对的东西也加以反对,而一些该继承的东西又继承不够。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对思想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有些简单粗暴,急于求成,致使在感情上伤了一些人^[24]。也有一些研究者指出,在一开始,首先运动要达到什么目的,解决哪些具体问题并不明确。因政策界限不够清楚,出现了批判面过宽,否定自己过头的偏向^[25]。还有一些论者认为,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不可否认,检讨者大多认真接受思想改造,真诚悔过自新;但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他们的检讨起了决定性作用也

是毋庸置疑的^[26]。

二

关于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初海外中国研究界便有所关注,而其中思想改造问题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海外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因能力所及,现仅将搜集到的海外研究中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及其观点作一简要综述。

(一)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一书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于知识分子的“包下来”的政策。书中指出“中共进入大城市之初,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基本上算相当宽厚。原本在大中专院校教书的,仍旧教他的书,原来在机关单位任职的,也继续任其职,一切维持原状;失业知识分子的基本生活反而得到前所未有的照顾。……总的说来,中共透过‘包’下来的政策,变成知识分子的衣食父母。”^[27]《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提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放松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以争取赢得他们的忠顺。在最初,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欢迎党的,因为他们讨厌国民党,又因为他们珍视党有统一国家的能力,还因为党有能力在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混乱之后保证了财政的稳定^[28]。“党以苏联为借鉴,给知识分子支付工资,负责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29]但是随即又指出“党对知识分子的和解政策为时甚短。”^[30]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细致地分析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心理。书中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具备一种复杂的心理。一些没有参加过革命的知识分子怀有愧疚心理,而另一些参加过革命的知识分子由于新政府给予的良好待遇而怀有感激心理^[31]。陈永发在对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作出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愧疚心理是推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强大推动力。正由于这种愧疚的心理使“知识分子因为心中的愧疚而承认自己需要改造。因此他们对中共的思想改造工作,与其说是抗拒,毋宁说是欢迎”^[32]。并指出,在毛泽东发表公开讲话,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之后,“当时,无论老师或学生都积极响应,惟恐自己成了沧海遗珠”^[33]。

(三)思想改造的目的。海外学者对于这一问题通常是将其置于中共政治统治这一角度下来考察

的。而这一角度他们往往又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一是从思想本身来讲，强调中共的思想控制；二是从知识分子与新生政权之间关系来考察，强调改造是为了确立知识分子对于新政权的认同。陈永发认为，这次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便自我改造。《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认为这场改造“它的目的是要洗净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再给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34]。Theodore His-en Chen 在《1949年以来中国教育的学术化和革命化》一书中认为“在新政权成立的初期，要想使毛泽东主义的一套术语流行，那些过时的旧思想必须被‘清理’”。比如知识分子中的个人主义：“思想改造的一个清楚明确的目的是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个人主义。”^[35]而罗伯特·利夫顿则强调：“50年代早期‘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以对现政权的新式孝道来取代构成传统中国核心道德价值观念的孝道。”^[36]

(四) 思想改造的方法。有海外学者将它与整风方法加以对比，陈永发认为，思想改造所使用的方法与整风大体相同，无非是听报告、读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情况进行检讨，等等^[37]。而在高等学校中，“中共的目的是积累足够的人事资料，再加以彻底清查，然后建立经常性质的政治机构，以便管理学校的人事”^[38]。此外，还有一些海外学者分析了改造中的心理学原则、方法。Robert J. Lifton 就认为，中共思想改造中体现了心理学中的五个原则方法：环境控制(Milieu Control)；罪状，羞辱，坦白(Guilt, Shame, and Confession)；群体分析及其认可(Group Analysis and Sanction)；情感吸引(Emotional Appeals)；角色和个人身份的转变(The Shift in Role Behavior and in Personal Identity)^[39]。

(五) 思想改造运动的评价。关于这一问题，海外学界既有对思想改造的方式等的评价，也有从效果方面进行评价的。前者以陈永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为代表，后者以 Robert J. Lifton 等为代表。陈永发认为改造基本上比较“温和”，“不算严峻”。他指出，1953年以前，中共以比较温和的手段改造知识分子，“这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不算严峻，仅少数人真正遭殃”^[40]。但也提出了运动中的过火情况。《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指出“50年代初期的这些运动比从前反对王实味和萧军的运动要克制一些。它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预防可能的颠覆

活动，而不在消除任何公开表示的批评。党也没有来得及以从前推动运动的热情来做意识形态的统一工作。虽然知识分子也屈从于要他们改变他们的西方自由主义立场的努力，但党还是谨防措施粗暴，以免他们离心离德。”^[41]而 Robert J. Lifton 认为应该将被改造人群的效果分为三类：一是完全转变的，即成功的，这主要是青年人；二是抵制的，他们中的很多从大陆逃离了；三是介于前两类之间的，也是人数最多的，他们是部分地相信了，但是本质上关注于使自己适应强大的压力和确保自己在新政权下的未来。总的来说，思想改造在多数学生中思想和感情上产生了对中共政权有利的反响^[42]。

三

近年来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仅是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作为专题研究也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兴趣。就方法论而言，关于这一问题海内外学者存在着以下不同之处：第一，叙述的方式不同。中国大陆学者多倾向于宏大的叙述方式，而这一宏大的叙述方式又往往是表现为将历史事件结构化，同时大陆学者也比较注重文章本身的逻辑结构和条缕的分析。而海外的研究者则更注重的是“讲述故事”式的对于史料的梳理及旁征博引的中外著述。在对于同一历史事实的认定上，两者描述的是同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但是由于遣词造句的不同，传递给读者的信息差别却很大，这主要也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造成的。第二，研究方法的不同。中国大陆学者多运用历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更为关注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事件背后中人物的心理因素等，却常常是被忽视的一部分。海外的研究者往往善于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这一点在前文所提到的 Robert J. Lifton 的研究中就可可见一斑。Robert J. Lifton 不仅运用了心理学研究方法，而且还运用口述史学的方法。他研究中的很多材料是其采访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得到的。因此，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中国大陆学者也应当善于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第三，材料取舍的差异。在材料的取舍上，中国大陆的学者和海外的学者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就中国大陆而言，研究者使用的材料大多是领导人的文集、选集、传记及报刊等资料，民间资料使用得较少，海外相比较而言，民间材料使用得较多，但是也存在着民间材料使用上的去伪存真问题。

通观海内外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以下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挖掘史料问题。笔者认为,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最为重要的是挖掘“活史料”。这主要就是通过口述史学的方法从经历过思想改造的当事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史料。因为当事人或去世,或已经进入晚年,因此这在当前又是尤为紧迫的。其二,思想改造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思想改造问题从内容上说是解决思想问题,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个人的修身问题。那么,二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呢?或者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指导思想、方法等方面是否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呢?其三,思想改造与苏联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实践关系问题。众所周知,中共很长一段的历史都与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相继出版了一批苏联学者关于苏联知识分子的论著,如柯伐列夫的《知识分子在苏联》(1949、1950)、普洛茨科的《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苏联知识分子》(1950)和《苏维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1951)、卡夫坦诺夫的《苏联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1951、1953)、慧文辑译的《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教育》(1952)、周平辑译的《苏联知识分子的马列主义教育》(1952),等等。可见,二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值得关注。其四,思想改造与社会变迁问题。如思想改造与教育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思想改造对于社会心理、行为等的影响等问题依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在研究中既需要有宏观的研究,同样也需要有更加微观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朱文显. 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396.
- [2][22][25]刘建清,刘庆楚. 论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J]. 中共党史研究,1991(5).
- [3][13][18]于风政. 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208; 201—208; 22.
- [4]金冲及. 周恩来传[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188.
- [5][7][9][11][20][24]谢莹. 建国初期知识分

- 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始末[J]. 党的文献,1997(5).
- [6][26]笑蜀.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J]. 文史精华,2002(8).
- [8][23]张舒屏. 思想改造运动:和风细雨中的苦涩[J]. 唯实,2000(11).
- [10]邱忠信. 建国初期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政策和特点[J]. 社会科学战线,2006(4).
- [12]朱地. 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历史考察——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观点[J]. 中共党史研究,1998(5).
- [14][17]郑应洽. 关于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
- [15]崔晓麟. 20世纪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原因初探[J]. 兰州学刊,2005(1).
- [16]崔晓麟. 重塑与思考 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 [19]崔晓麟. 浅析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J]. 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11).
- [21]蔡达勋,吴彬彬. 建国初我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回顾[J]. 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2).
- [27][31][32][33][37][38][40]陈永发. 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M]. 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661; 658; 659; 662; 662; 669; 670.
- [28][29][30][34][41][美]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56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46—247; 246—247; 247; 246—247; 248.
- [35]Theodore His-en Chen. Chinese education since 1949 academic and revolutionary models[M]. New York: Pergamon Pr., 1981:49.
- [36]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M].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234.
- [39][42]Robert J. Lifton, Thought Reform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 Psychiatric Evaluation[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56(1).

[责任编辑:黎伟盛]